



#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 (美)迈克尔·加拉蒂(Michael Galaty) 著

◆ 陈 淳 译

(复旦大学文博系)

## 前 言

1807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成立了“国家古物保护与收藏皇家委员会”,这是当时欧洲第一个对考古遗址进行登记的机构。一个世纪后,克拉克盛赞皇家工兵在英国军用地图上标出古代纪念建筑的工作。今天,丹麦和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的国家考古资料库的两个国家,全欧洲的国家都以它们马首是瞻。然而,欧洲的聚落形态研究还不能堪称完美,尽管技术上的变化已经将我们带到了成熟的边缘。

彻里在1986年而后又在1994年宣称,考古区域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正掀起新一波深入和系统调查项目的浪潮。在最新一项回顾中,希格斯声称,这一浪潮已经达到顶峰,而欧洲区域研究的未来就在眼下。那么,欧洲区域考古到底新在哪里?

本文,我将回顾当下欧洲聚落形态研究的情况。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会介绍特定的课题,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侧重新的理论和方法交汇点,无论是远古还是晚近,我们对欧洲过去的了解在哪些方面有所修整,在某些情况下,被重新思考。我从对欧洲聚落研究历史的概论开始,然后转向特定的研究问题,以及可能的答案。最后,我会介绍我们对欧洲聚落历史变迁的了解。虽然对一些关键阶段看法的变化比较明显,但在生活方式包括聚落形态转变时期而言(比如现代人出现、农业扩展和国家起源)相对迅速的变迁尤其明显。

## 温故而知新:欧洲聚落研究简史

欧洲的范围很难定义。在此,我不想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也不想回顾欧洲每个国家的聚落研

究。我只是集中在能说明方法论和理论进步,或对我们了解欧洲聚落形态历时变迁作出贡献的特定研究项目。根据对讨论的特定问题性质的了解(比如农业的扩散是如何影响到聚落形态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中欧大部)覆盖着大片灌木,而其他地区则给予了非常特殊的关注。在有些做了很多区域分析的国家——如英国、丹麦和希腊——得到极大的关注,而其他国家则关注较少,甚至不予关注,如前苏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一种出版物的偏颇——一般难以获得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聚落材料——但是,许多西欧国家相同的聚落形态分析传统,在大部分东欧国家里并不存在。

尽管区域研究传统存在差异,但是围绕欧洲大片区域的一种广阔视野极有助益,揭示了跨越现代国家疆界的行为方式,这在过去往往毫无价值。虽然北欧的环境和聚落考古在许多方面与南欧并不相同,但是这两个区域,以及整个欧洲在过去各个时期通过贸易,还有迁移、殖民和征服的过程被联系起来。因此,尽管有一些分析上的难度,但是欧洲大陆可以保险地被作为单一的大型研究单位。事实上,有些研究问题(如现代人在欧洲的出现和扩散,罗马帝国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大陆范围的视野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新大陆,对“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是这一术语在旧大陆并不常用。欧洲考古学家常常从事“区域研究”或进行“景观考古”,不一定包括聚落形态分析(我将其定义为研究过去人类活动的遗址,包括但并不限于栖居地,以及他们在一个较大区域活动范围里彼此面对面的位置)。当欧洲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东

\* 译自:Galaty, M.L. European regional studies: A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3(4): 291~336.

欧的考古学家)确实采用“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中的聚落术语时,他们脑子里想的常常还是调查一处居址的内部结构,而非研究区域聚落形态。基于这个原因,我采纳了一些居址构造和聚落结构的研究。在欧洲大部,要探讨聚落形态,首先必须了解“聚落”一词是如何使用的,以及各种形态显现之前是如何登记到地图上去的。

20 世纪初,许多欧洲考古学家忙于在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框架内,定义他们国家范围内古代文化的特点,即它们的“文化历史”。聚落考古就首先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最初由德国史前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所建立。科西纳的方法,主要目的是要论证德国的人工器物,以便将德国文化的扩散和影响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后来被纳粹所采纳。然而,在二战之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显赫的大遗址(诸如庙宇和城堡,特别是希腊和罗马的遗址)。科西纳和德国领导层,特别是希姆莱,更加着迷于证实德国人在过去曾占领过欧洲大片疆域。结果,这使得分辨德国聚落,特别是德国想入侵国家如波兰的聚落,并将它们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变得十分重要。德国聚落考古学被赫伯特·扬库恩在战时所完善,并一直保留下来,成为 20 世纪下半叶一个关键的欧洲研究焦点,尽管它与民族主义和独裁为伴。戈登·柴尔德最早建立起文化-历史学框架(在 1925 年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成型),并继续采取对聚落和物质文化材料的详细研究,以求将文化群标示在地图上,并追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强烈影响到后来欧洲史前学模式。在中欧和东欧,纽斯图普尼和库纳构建的“社群区”(community areas)概念变得非常重要。即便如此,许多欧洲考古学家对聚落考古仍持谨慎态度,特别其最终目的是要分辨古代民族群体的时候。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受美洲和中东地区所从事工作影响,欧洲考古学家开始为过去建立起清晰的区域方法。从事区域调查来收集区域规模的材料,成为基本的手段。欧洲最早的系统调查范围很广,有许多是在英国、意大利和希腊进行的,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地形学的”。考古学家系统地调查感兴趣的地形,以及与其相伴的遗址类型。正式始于 1962 年,由威廉·麦克唐纳和乔治·拉普领衔的明尼苏达大学的美塞尼亚计划,就是这种早期“地形学”调查的最好例子。美塞尼亚计划在希腊美塞尼亚地区广泛调查迈锡尼的“内斯特宫殿”遗址,

寻找青铜时代晚期的迹象。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遗址。根据在英美及其他地区所从事的研究,彻里新一波的希腊调查范围很广。主要目的,但实际上很少能做到,是想调查所有地形,以避免地理学偏颇的指责。所有发现的遗址都被记录下来,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部、广泛覆盖某个区域,或覆盖该区域的一块样板部分。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就是“第二代”希腊调查的很好例子。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对美塞尼亚计划先前勘探过的美塞尼亚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该计划的一个目的是要评估像美塞尼亚计划这种广泛调查的能力,寻找小遗址,即处于聚落等级底部的那些遗址。就像它指出的,“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系统的区域工作部分证实,由美塞尼亚计划根据不那么广泛的调查,勾画出的是一幅印象主义的图像。”

虽然这新一波欧洲调查计划的结果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发表,但是有些学者,特别是古典历史学家(他们是调查计划的第一代人)感到失望,发现考古的结果很难加以阐释,因此也难以相信。作为回应,许多参与调查的考古学家承认,精细地表调查在制图的方法论上确实存在问题(比如采样问题、地表可见度、遗址定义等),需要进一步研究。结果,也许就像在美洲和近东常见的那样,最近欧洲区域考古学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方法论的关注,而非更高层次、更广范围聚落形态的阐释上。

最近几年,欧洲考古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景观研究”(landscape studies)上,与看似一场全球的考古学潮流融合到一起。欧洲景观考古学家把整个景观,象征性地当作一种不断变化的人工器物来对待,其整体都值得研究。景观概念可以说是将区域分析的所有方面整合起来,将生态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方法结合到一起。今天在欧洲,聚落形态分析几乎总是被归于某个区域的大范围研究名下。采取这种方式,聚落只是一类景观的组成部分,多项中的每一项(包括地形、水体、森林等)均同样值得研究。这对于完整了解一个区域,以及完整了解曾经栖居于此的人群而言至关重要。由于这个原因,我回顾了许多包括有聚落形态分析的、自诩为景观研究的项目。

有些考古学家日益关注的是,欧洲区域研究项目收集的聚落材料常常是注重小型的、范围明确的景观,是否能够被用来讨论新考古学特定及一揽子有关过去人类行为一般的比较性问题。有些学者,

特别是美国学者指出,欧洲考古学家收集的聚落材料,在规模上鲜有大得足以可用于了解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形态。但是,欧洲区域材料采集的规模和细致,并非完全如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受到经费和时间具体关注的左右。欧洲考古学家也没有配置不同类型的技术,因此可分别处置十分不同的材料。然而,欧洲发展出意义重大的不同方法和理论视野。与其他地方相比,特别是中美洲和北美,在欧洲工作的美国人和在欧洲工作的欧洲人之间,也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例如,一种特殊的欧洲景观考古学的出现,主要是基于哲学的“现象学”学派,其表现,在总体上很像欧洲考古学后过程倾向的探究,在具体特点上很像欧洲区域研究。然而,大部分最近的欧洲区域研究项目看来结合了等量齐观的过程和后过程方法。

### 欧洲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大约在过去十年里,有关欧洲过去聚落的文献量激增,部分是因为对景观研究的兴趣高涨,也因为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区域考古学方法和理论上的巨大投入,现在已获回报。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拥有了过去所有时期充分的聚落材料。不断扩充的资料库的规模和质量,也得益于新技术如更精确的遥感装备、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采用。当新的方法、理论和技术结合到一起,并用于考古区域,便会对欧洲考古记录做出新的阐释。

本文中,我反复强调两大问题,总体对于所有时段的欧洲聚落考古都非常重要。第一个是理论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过去人们是在哪里生活和劳作的?在欧洲,在用生态学和社会学方法来询问有关聚落形态与聚落位置历时变迁之间的问题时,存在很大压力。大部分在欧洲工作的考古学家试图平衡这两大关注,但是受到他们材料性质的制约。例如,在某些地区如英国,居址不易分辨,特别是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的某些阶段。但是,纪念性遗址(比如围堤、巨石阵、古坟、立石)到处可见。结果,这些地区的考古学家一般并不分析聚落本身,而是利用纪念性建筑为依据来衡量不同人群生活的范围,他们如何互动,他们对生计需求(去何处狩猎、栽种庄稼和放牧动物)的社会关注(如祭祀生活)在什么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景观经验,虽然这种方法最近被认为越来越有问题。这种对地形和纪念性

建筑的强调,鼓励了后过程、有时叫“现象学”的理论观点。在地中海和中欧与南欧,情况则不同。在那里,一般而言,史前居址能够分辨出来,而“神圣景观”如果有的话,大体上触手可及。在保加利亚、匈牙利、马其顿、塞尔维亚、塞萨利和希腊,新石器时代遗址都以大型土丘的形式存在,很容易看出来,里面保留着丰富的聚落内部结构以及生计的信息。在这些地区工作的考古学家倾向于强调生态学和生计,而较少关注聚落和土地使用的后过程理论。

第二个问题大体上是方法论的。什么是一个“遗址”?我们如何能成功地找到遗址?例如在一个地区找到了所有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就够了,还是也必须找到旷野遗址?我们必须讨论遗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些空间也被利用过,但是如果那里没有器物或仅有很少器物被发现又是何为?是否缺乏证据就可认定为没有证据?新石器时代再度具有启发性。现在日益清楚的是,在英国实际上能够发现居址。困难在于要知道找什么,以及最好怎么找。知道如何找,很大程度上就像理论取向一样,已经成为一个要害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最近几年里被装备的技术如遥感方法、GPS和GIS的改善所促进。

#### 欧洲的勘查考古:近观或远眺?

在欧洲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何应对发现聚落遗址,以及解释聚落形态的方法论难点?在史前早期的早期阶段(旧石器和中石器,及某种程度上的新石器时代),争论集中在如何完美地解释发现集中在洞穴中或遗失在地表的石器采集品。就发现和解释石制品分布的难度,一些勘查考古学家声称,史前景观基本上是“隐匿”的,而且我们极大低估了早期史前阶段聚落的不同层次。作为回应,宾特利夫等建议,当勘查中发现景观里存在的器物如石器和史前陶器太少,可采用“修整因子”(correction factors)来向上调节器物的数量。但是,这种方法会掩盖区域聚落形态和密度的真正差异。例如,戴维斯证实,基于石器采集品的仔细调查,希腊美塞尼亚以及阿尔巴尼亚马拉卡斯特拉的旧石器/中石器时代聚落之间的差异,是真实和有意义的,在这些阶段里,马拉卡斯特拉的聚落确实看似比较密集,而在美塞尼亚则无需修整。

调查材料是否真实和准确反映了过去聚落形态的问题,也影响到对晚近时期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解释,在那些时期里,居址和神圣遗址一般而言要



更大和更显著。考古学家以各种不同方式,从方法论和理论上应对这个棘手问题,而聚落形态研究的含义有多种,虽然问题本身看来并非不可解决。根本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一个特定的聚落系统中锁定所有预期的遗址;如果不能,那么又为何不能?在讨论有历史资料的地区和时段时,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在希腊始于青铜时代)。这是希腊勘查考古学家中的古典历史学家询问的首要问题。我们的文献告诉我们这里应该有遗址——它们在哪里?

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在于,遗址确实隐匿在某处,被沉积物和植被所掩盖。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决地质学的影响和野生植被和庄稼的覆盖,来锁定那些在较大聚落遗址形态中看似缺失的遗址,特别是小型遗址?例如,在希腊,冯安德尔根据新的气候学和地质学材料,详细解释了沿海地理的变迁。他对景观变迁的重建,深刻影响了我们对史前聚落形态的了解。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诸如弗兰克西洞穴(Franchthi Cave)这样位于海滨的遗址在过去并非如此。同样,不见了的遗址,如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大本营,现在已在水底。而且,冯安德尔与赞格尔一起进行各种考古勘查项目,力图分辨希腊过去的土壤侵蚀期,很可能极大地破坏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农业系统。就如约翰逊所形容的,当希腊新石器时代终结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高地裸露,土壤遭到破坏,导致灾难性的侵蚀。水土流失有可能导致了青铜时代早期经济的“崩溃”和后来聚落的收缩,同时,侵蚀掉早期遗址或将它们与移位的土壤混到一起。区域考古记录的地貌学方法在与基于孢粉材料的古环境重建结合起来后,如虎添翼。孢粉学家常常能够准确决定森林消失发生的情形,这导致后来的土壤侵蚀问题。

由于地貌学对发现古代聚落形态的巨大影响,因此欧洲大部分的区域项目现在都雇用一名地学考古学家(或地学考古学团队),他们在调查之前和调查当中,帮助解释景观变迁和土壤侵蚀的影响。结果,我们能够非常肯定地说,当一个景观中不见遗址是它们从来就不存在,或者它们已被埋在某处。如果被埋,地球物理学方法如磁力仪和电阻仪有时能够被用来确定它们的存在与缺失。土壤的化学分析特别是磷酸盐,能够独立或结合遥感技术来发现遗址,并改善对范围和功能的估计。地理信息

系统结合地貌学、考古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资料,助益非同寻常。有时,甚至被地质学过程藏匿的景观也能够被发现,并标示在地图上,完善以前不完整的聚落形态。

显然,植被也能掩盖遗址。通常,考古学家在勘查中将植被和可见度标示在地图上。然后,它们在GIS中与考古材料联系起来,于是在一个调查区域分辨出由于可见度差而无法发现遗址的地方。然后,有可能的话,对这些地方可以做更加彻底的搜寻。此外,经验课程认为,可见度与器物的发现是成比例的,但是并不均等,也就是说,可见度下降10%,并不一定导致发现的器物也下降10%。于是,仅凭用于说明可见度差的修整因子不一定能奏效。因此,有些考古勘查项目采取它们自己经验性的器物采集步骤,根据不同的勘查条件,以建立野外团队可能会遗漏的最低衡量尺度。简言之,理论方法以及技术的改进,使得勘查考古学家能说明因不同可见度造成的器物采集问题,到现在,已不太关注因地质和植被干扰影响导致聚落形态可能的失真。

对于勘查考古学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义“遗址”。遗址是真实的,还是概念性的实体?因此,一个遗址的定义是否会在景观里赋予一个位点以优惠,而损害了其他十分有意义的位点?如上所述,“遗址”之间的区域是否像遗址本身那样,对我们了解聚落形态是有意义的?考虑到遗址概念的这些和其他问题,有些在欧洲工作的考古学家提议另类的术语(“比如真实分布之上的反常密度”、“特定关注位置”)。许多欧洲专家根据最初由邓内尔表述的想法,设计了所谓的“无遗址勘查”。在无遗址的勘查中,考古学家在整个景观地形中寻找器物密度的变化,对于看似重要的遗址(也即“分布”勘查)不做裁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全覆盖勘查策略的方法,目标是针对在整个区域的地表,抑或是一种采样策略来了解整个地表器物的变化。

当一片区域被充分勘查之后,采集的材料必须加以阐释:过去人群是如何利用景观的,结果会导致器物在原来位置作如此分布?以这样的方式,无遗址勘查增强了遗址形成过程影响的重要性,其中有许多是受行为而非地质过程的支配。是这些动力,将器物分布和反复分布于不断变化的景观地形上。大部分是因为人类总体上利用整个景观的结

果,使得聚落研究成为一种比专注于遗址考古更加复杂的工作。例如,有人认为,低密度的器物集中(有时是指“背景的噪音”[background noise]),也许是由于古代施肥的结果,使得器物围绕古代遗址分布。同样,现代农民收集肥料的粪堆,会将古代(和现代)的陶片混到一起,被集中起来后,再散布到农田里。这些陶片会被发现在勘查过程中,并被认为是一处考古遗址或过去人类某种行为的指示。

有些勘查考古学家设法走一条中间路线,采取全覆盖的分布景观考古学,但并不完全放弃遗址概念。常常与高端GPS相联的GIS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方法,使得区域规模的器物密度能够被标示在地图上,并能做很有意义的分散点位和递减形态的数理分析。然后的工作是要解释密度分布。有些器物密度很高的区域,从狭义(即聚落遗址)而言也许是“遗址”,但也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文克洛瓦在波希米亚采取细致的区域勘查,以分辨和研究青铜时代聚落与工业遗址,而菲尔德调查了英国新石器时代火石开采遗址,与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利用时间很短的聚落遗址之间的关系。其他考古学家调查了器物分布与各种景观类型界线之间的关系,以分辨不同时空范围里,聚落与利用林地、沼泽与湿地、河流与洪积平原、海滨和岛屿之间的关系。神圣景观也以这样的方式加以讨论,将聚落与祭祀遗址的位置加以比较,有时采用GIS的视域分析(viewshed analysis)方法。该方法一个有意思的发挥,不仅是思考视域,也要思考声景(soundscapes),在一处特定景观中,祭祀活动发出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最后,有些考古学家发现,思考穿越该景观的路径(比如英国的“古道”[trackways])也非常有用,以更好地分辨和了解古代的聚落系统。

尽管有这些和其他器物分布分析的原创性方法,但是我们仍常常会困惑于一个“遗址”(或任何类型的器物分辨)是否真的是一个遗址。我们能够分辨出欧洲景观中那些有趣的点位,但是在缺乏遥感和试掘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无法肯定地说人们原来在此干了些什么。更有甚者,虽然考古学家也许对这些点位极感兴趣,但是它们对造就了这些地方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问题对于勘查之后没有跟进试掘的那些欧洲国家特别成问题,特别在古典世界。例如,在希腊,考古勘查和发掘的许可是分开发放的,并数量有限。谁能得到许可并进行勘查和发掘的决定,大体上是政治性的。结果,考古学

家并没有设法将区域勘查与大范围的试掘计划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小型、看似保持较差的遗址(当然有例外)。这对于我们解释过去聚落形态的影响甚大,特别是原史和历史时期,对于它们我们拥有聚落和土地利用的文献记载。

### 欧洲聚落形态历时变迁

现在,我来详细回顾一下欧洲聚落形态历时变迁。有关聚落某些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看法最近已经改观,部分是由于新的发现,但是也是由于上面概述的理论方法的原因。

#### 旧石器时代聚落

现在清楚的是,人类至少50万甚至可能70万年前就已居住在欧洲,尽管对早期迁徙的时间和方向仍不清楚,对旧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了解不多,但明显的是,有些早期人属的分支如海德堡人在50万年前抵达了欧洲许多地方,并在50万年前稳固定居下来。有些人声称,发生在50万年前的环境变迁,使得人类一次性进入,但是克里夫·甘布尔对“欧洲大门”前的“漫长等待”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

欧洲最早的聚落(50~30万年前)是沿河湖边、有时是在海边确立的,如英国的博克斯格洛夫(Boxgrove)和法国的特拉阿马塔(Terra Amata)遗址。偶尔也利用洞穴,比如西班牙的阿拉戈(Arago)和阿塔普艾卡(Atapuerca)。当他们渗入欧洲,看来古人类仔细选择哪里可以栖身,而气候和资源是主要的决定因素:需要可栖身的岩崖,便于接近资源、猎物和水源。例如,希腊大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发现在水源附近,有些沿河岸,比如塞萨利的佩内厄斯(Peneios)。1991年在科基诺皮罗斯(Kokkinopilos)发现了一件手斧,伊庇鲁斯(Epirus)的早期人类,开拓岩溶盆地丰富的资源,喀斯特地形有许多湿地和湖泊。因此在希腊,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讨论常常强调环境条件,比如海平面的变迁。

根据甘布尔的研究,环境确实对欧洲的早期定居产生过作用。但是,古人类应对环境受制于他们社会系统的规模和结构:“这些古人类占据一个地区的能力不只是受制于这个地方的环境条件,还受制于他们自己应对这类环境的组织反应。他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有社会授受的文化行为来壮大自己。他们并不仅仅是顺着更新世的节拍起舞。”早期古



人类的聚落系统无一例外都很小,限于很小的群体,很少开拓30公里以外的资源。这种小型群体很不容易维持更新世生活节奏所要求的那种分分合合,他们还不具备建立在复杂、象征性行为基础上的必要社会网络,有了这种行为才使得占据广袤的欧洲大陆成为可能。这种行为一直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

对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尽管对于尼安德特人发展的命运已有一种共识。他们看来被现代人类逼上绝路,最终被驱逐到欧洲边缘而慢慢绝灭。还不十分清楚的是,为何现代人类能够取代尼人,是什么让晚期智人将天平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倾斜。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在于将尼人和现代人聚落和精选的遗址标示在地图上,包括洞穴和旷野遗址。在这一工作做得系统的地方,看来明确的是,尼人并不完全以一种后勤移动方式来开拓资源。例如,朗内尔斯和冯安德尔将伊庇鲁斯的资源开拓称作是“部分后勤移动”方式。尼人的社会和经济网络看来也并不比旧石器时代早期所见来得更大更复杂。同样有趣的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晚段,在过渡时期当中,欧洲某些地方尼人的工具套和觅食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已有点像后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于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现在看来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突然。这一解释,就像其他解释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发现和发掘旷野遗址的新愿望,于是可充实过去几乎完全基于发掘洞穴遗址的聚落形态。因此,在通过系统的地表(和洞穴)勘查,并结合有目的的验证发掘重建起旧石器时代的聚落系统之前,我们无法肯定,究竟是什么使得现代人有别于尼人,(语言、艺术、祭祀?)尼人的土地利用是否完全是后勤移动的,以及在奥瑞纳期之前、期间及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尽管设计来检验旧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系统假设的研究项目还未展开,但是最近完整的研究项目已经讨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和土地利用问题。其中之一,克利希项目根据在伊庇鲁斯、希腊的研究,在乔夫·贝利的指导下,试图评估埃里克·希格斯的聚落模式,这个模式预想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像是现代游牧民族的那种季节性迁徙。二十年里,贝利和他的同事们重新研究了由希格斯采集的资料,发掘了克利希大型旧石器时代晚期岩崖,并系统调查了整个沃伊多马蒂斯盆地(Vordomatis

Basin)。他们分辨出几百个新遗址(即发现点位),使得能够对伊庇鲁斯的聚落形态做出重新的阐释。希格斯的模式至少部分是准确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实际上随季节性周期而动,在平原(它们大部分现在已被淹没)和山地之间来回移动。但是,狩猎者并不尾随着有蹄类动物(就像牧民尾随他们的羊群),而是为非常特定的目的占据各个洞穴来猎取特定的物种,比如伊庇鲁斯地区的巨角山羊。山地遗址并非大本营(home bases),它们沿迁徙路线分布,是特殊目的的狩猎营地。

与尼人相比,伊庇鲁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看来与景观有一种十分不同的关系。还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如法国西南部。在佩里戈德(Périgord),奥瑞纳时期“进化出适应决策的能力”,以利用各种不同环境,系统并有效地开拓不同猎物资源,而同时又从离家4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办石料。然而,就如布雷德指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复杂的社会和象征性结构中”从事这些活动的。比如,它们被以洞穴壁画的形式反映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景观中。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一种高度构建的聚落系统发展起来了,以三层不同等级规模的遗址为特点,最大的是可能用于多种目的的“聚集性”遗址。就如甘布尔所言,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社会景观”,以便将“社会系统向时空延展”。到此,我们的社会和聚落系统才演化成真正人类的系统。

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过渡还是转型?

中石器时代一度受到关注,仅仅是因为它在年代上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后两者都是“成就”可观的时代。但是,现在中石器时代是一段适应于环境剧变的时期,也是巨大发明的时段。在整个欧洲,在更新世末,气候与环境发生剧变,聚落也是如此。冰川后退,旷原被森林覆盖。冰期哺乳动物或绝灭或向高纬度地区迁移。例如,生活在佩里戈德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狩猎的大群驯鹿群,从欧洲大部分地区消失。随着海平面上升,沿海平原慢慢收缩,而新的生态系统如沿海港湾形成。中石器时代人类采用发明的技术,收获“广谱”的动植物。构建起来的中石器时代聚落系统,能有效地从极度多样化的全新世环境中获取食物。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我们也能一睹中石器时代的祭祀景观。这一时期后段,沿大西洋沿海,欧洲人建立起他们最早的石砌纪念建筑。而后,后续的新石器时代

人类,将其种子以各种方式撒播在中石器时代景观的沃土上。

过去以为,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是流动的,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人是定居的,但是这种区别已经模糊。例如,十分明显的是,法国南部的有些中石器时代群体建造起永久性的房屋,有大型的村落,凭借“复杂的”狩猎采集经济过着定居生活。最好的例子来自塞尔维亚勒潘斯基维尔(Lapenski Vir)附近的铁门( Iron Gates)、希腊的弗兰克西洞穴和最近发掘的马洛拉斯(Maroulas),这是基斯诺斯(Kythnos)基克拉迪岛(Cycladic island)上的一个大型中石器时代村落。在欧洲其他地方,比如欧洲西北部和英国,从饱水遗址中常常见有非常复杂聚落形态的证据,比如南部的斯凯特霍尔姆(Skateholm)。在丹麦东部的萨尔特巴克维格(Saltback Vig),普赖斯和格巴尔从中石器时代晚期的“埃特博里文化”分辨出非常复杂的聚落形态。而且,许多考古学家开始对新石器时代农人总是维持一种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相反,看来很可能,特别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家庭式的永久性聚落数量不多,而欧洲最早的农人至少有时需要流动,也许采取一种游牧的维生经济。于是,最近几年里,中石器时代觅食者和新石器(也许包括青铜时代早期)农人看上去已经十分类似,而非彼此有别,各阶段的聚落系统在规模上和复杂性上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很可能都需要一种所谓“辐射”的开拓系统)利用不同类型的资源(野生的和栽培的)。最终(北欧大约在青铜时代中期,南部较早),农耕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类对土地、景观和土地使用观念的革命性转变。解释这一转变——私有和圈地,随之是社会分层的加剧——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目标。

虽然,最早驯化的动植物何时到达欧洲还不十分清楚,但是看来很可能的是,人类占据和采纳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同一扩散过程,即便两方面对整个过程的相对贡献还没有完全弄清。最近,从各地区得到的材料表明一个非常复杂和漫长的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五千年以上),这一变迁最终影响到整个大陆。但是,使许多考古学家感到惊讶的是,最近的遗传学证据看来表明,农业的扩散“……对欧洲人线粒体库仅有大约20%的贡献”。当然,将占领和采纳农业区分开来的关键手段,是将中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加以比较,虽然这种方法取

决于对某个地区两个阶段区域规模聚落形态材料的收集,而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

欧洲农耕的最早证据来自希腊,农业在公元前第七千年抵达那里。在希腊,中石器时代的证据很少,但在逐渐增加。了解最清楚的是位于阿尔戈里德(Algolid)南部的弗兰克西洞穴,在那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与希腊南部缺乏这样证据的其他地区不同,弗兰克西有新人移入该遗址的极佳证据,他们在海滨的洞穴前面建立了一个村落。在弗兰克西,新石器农人看来直接占据了中石器人群的领土。现在,希腊南部的其他地区、希腊北部如弗兰克西和阿尔巴尼亚,也存在中石器聚落的证据,常常位于利用丰富海边湖滨资源的地点。尽管弗兰克西洞穴是个例外,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看来都是在没有中石器聚落的地方发展起来。看来有可能的是,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来的农人取道海路占据了这些地方,寻找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沿海平原。如果有中石器人群生活在附近任何地方,他们看来要么早已移往别处,要么最终也采纳了农业。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石器人群看来占据了空旷的土地,特别是中石器狩猎采集者所未利用的冲积平原。这种沿海的占据线路沿大西洋北岸迅速延伸,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到达伊比利亚半岛,这可以饰有刻戳线纹的所谓“卡迪尔”陶器分布为标志。例如,最近在意大利的勘察工作显示,在地中海西部的有些地区,新石器聚落的密度就像意大利塞萨利那些密集定居区域一样高,后者是欧洲新石器时代景观研究最为透彻的区域之一。

从希腊南部和西北部及阿尔巴尼亚获得的证据,能够与塞萨利的证据加以比较。赫尔斯塔德是第一位将希腊北部与南部进行比较的人,他声称环境的重要区别和年降水量导致新石器聚落的不同。在塞萨利平原,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中石器时代的栖居迹象,很可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新石器农人占据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几千年里,塞萨利的新石器聚落发展成了大型的土丘。在对最新证据的一项出色综合中,佩莱斯总体上进一步支持赫尔斯塔德的观点,声称希腊最早的农人仔细选择聚落的位置,开始是在南部(那里气候和环境很像他们近东的故乡),稍后是在塞萨利,以及北方的某些地方(如马其顿)。于是,对南北地区的占据,因应对环境的不同而彼此有别,但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发



展,其他因素(生活政治、经济、宗教)压倒了纯粹的社会经济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佩莱斯和其他新石器专家反对这样一种推测,即农人可能以一种统一的波浪式推进横扫整个欧洲的。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推进看来要比阿默曼等预见的那样更为复杂和多样化。虽然农人对环境的限制做出反应,但是也有社会的考量,更不要说分散但常常是密集栖居的中石器狩猎采集者领地的妨碍了。后来,其他重要的研究问题包括,是什么刺激了欧洲新石器聚落的发展,是什么左右着它扩散的方向和性质。

根据约翰逊的研究,希腊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系列的转变。最初,农业聚落的位置利用优良水源和冲积土壤,但是在新石器中期晚段和新石器晚期早段,这些背景中的许多聚落被废弃,聚落移到了南方的高地,或北方先前无人栖居的地方。这一转变也许与日益依赖所谓的“二级产品”如南方的山羊和北方的牛群有关。约翰逊分辨出来的第二波转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之末和青铜时代初期。聚落甚至变得更加分散,连边缘土地也随着一种犁(the ard)的引入而被利用。对土壤日益广泛的开拓和放牧,到青铜时代早期,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水土流失事件。约翰逊模式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希腊发生的这些事件,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方。总的来说,虽然农业的扩散看来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随着更多区域勘查资料的积累,从英国到希腊,从葡萄牙到德国,新石器聚落的扩散和发展在欧洲各地看来是沿着一条相同的轨迹。

最终,欧洲新石器群体从欧洲东南部北移,进入欧洲中部和西北部。这一始于大约 5500 BC 的扩散,伴随着所谓 LNK( linearbandkeramik ) 人群的迁移,他们可能源自匈牙利的斯塔沃 - 科洛斯文化。随着地中海西部沿海被占据, LNK 人群的扩散看来推进很快,大约 4500~4000BC,整个北欧包括英国和爱尔兰的最后中石器狩猎采集者,与林地的农人发生了接触,有时发生暴力的冲突。追踪 LNK 人群的扩散,主要依靠一种区域方法。在中欧和西欧从事的勘查项目揭示出 LNK 人群的长屋,有许多是以小群聚集在一起。这些 LNK “村落”的居所,有些长好几米,看来曾反复损毁和重建,遍布整个地区。还有,虽然 LNK 农人看来带着农业迁移很快,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推进真的犹如潮水。相反,他们顺着河流,有选择地渗入到北欧的原野之中,只利用某些类型的土壤,很可能尽量刻意

避开中石器人群。今天,几乎没有考古学家还会反对 LNK 人群的占据模式,但是沿资源丰富的大西洋边缘——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还有英国和爱尔兰——狩猎采集者被认为是同化而非取代的,选择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点滴,而非完全照搬。正如蒂利所指出,中石器和新石器早期人群看来对西北欧和英国景观有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理解,以相同方式栖居在那里。情况也许是新石器的某些生活方式对北欧中石器人群没有吸引力,那时定居的农牧业尚未发展起来。

布鲁克、惠特尔和其他人声称,北欧青铜时代早期,有些地区以较高的迁居移动为特点。这一解释并不单纯因为北欧缺乏实质性的新石器早期聚落结构,尽管有无数广泛的勘查项目。相反,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象征性的以灰坑(pits)为特点,里面填满了厨庖垃圾,或看似祭祀的堆积。英国采纳了农业的中石器人群很可能仍保持季节性流动,驱赶着牛群,在合适的情况下种植谷物。他们的居址非常短暂,对于景观没有持续的影响(奥克尼和设德兰用石块建造的村落是例外),新石器农人也许延续了先前中石器晚期的传统,建造巨型纪念性建筑,许多是用石头砌筑,用来明显标出那些重要地方,以便经常回来举行祭祀活动。因此,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的考古学家,与研究新石器时代纪念性建筑而又缺乏聚落的考古学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前者倾向于采取一种社会经济学方法,强调生计与环境,而后者采取其他的理论模式,构建常依赖现象学哲学派别的一种景观考古学。

#### 金属与聚落:解析因与果

金属加工大约是在公元前第五千年从近东引入欧洲的。开采铜矿和冶炼的最早证据发现在欧洲东南部,尽管希腊青铜铸锭的输入和加工还要早些。在欧洲的某些地方,在青铜时代之前存在一段比较短暂的红铜时代(有时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在红铜时代,起初天然铜通过冷锻被制成装饰品和斧头。后来才出现铜矿石的熔炼以及最后的铜锡合金。

金属加工在欧洲的扩散对聚落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有些地方,人群移向靠近铜矿的地点。在大部分地方,对金属的渴求刺激了贸易。在全欧,金属的出现看来与社会的重组相伴,开启了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尚不清楚的是,金属的引入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因。有可



能的是,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和经济转变,使得金属加工业的成长和发展、以及随后的社会等级化变迁成为可能。不管情况如何,社会变迁的确切性质会因区域而大不相同。例如,在希腊、保加利亚和西班牙,社会复杂化加剧,而其他地方如匈牙利,看来情况相反。尽管引入了青铜,并发生了聚落的相应变化,但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看来要比北欧更加进展缓慢,就像英国一样,经历了好几千年。

在希腊,青铜时代的开始(大约 3000BC)伴随着社会复杂化出现的最早证据。在许多地区,聚落规模增大,最早的真正村落出现。在许多这些村落中发现了社会等级化的证据,比如房屋大小的区别。在有些地方如勒纳(Lerna),大型建筑与集中的仓储建造在一起,并有图章和封存的记录。墓葬出土的证据也表明社会等级的强化。在整个希腊,人口和聚落伴随着强化的农业而扩展,农耕扩展到边缘环境。清除森林导致灾难性的水土流失,结果导致环境和经济的崩溃。传统上,希腊青铜时代的结束被从某种入侵来解释,这种入侵导致聚落形态的剧变,但是就如欧洲大部分地区,入侵的观点因其他解释的出现而失去了依据。立足于希腊勘察和发掘材料仔细结合的一种区域方法,已经证明可以摒弃入侵的假设。

在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各个地区,有更多证据表明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是连续的。例如,在湖居遗址的案例中(以瑞士最为著名,但在欧洲其他地方如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也有类似的聚落),金属与金属加工是加入到业已存在的聚落形态之中,这是一种开拓非常特殊富裕环境的聚落形态。但是,在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地方,聚落和经济形态经历了剧变。

在保加利亚东北部,最早的土丘出现在红铜时代,要比附近地区土丘的出现整整晚了一千年。这些土丘与使用和炫耀红铜和黄金相伴,它们被埋葬在极其奢华的墓葬里。在过去,虽然保加利亚东北部土丘的出现很晚,但是至少部分归因于金属的引入,它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但是,就如贝利所言,无论是新石器还是青铜时代,过分强调土丘是一种纪念性建筑,导致考古学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空间。遗址外(off-site)考古学改变了我们对保加利亚东北部土丘遗址以及对土丘的整体看法。根据贝利的研究,土丘的居民尽管从事农业并采取定居方式,但是他们仍然流动性很大,在原野里流动,就像他

们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期的祖先那样行事。聚落也并不局限于土丘,他们也在土丘的周围生活与劳作。然后,在中欧与东欧,无遗址调查(siteless surveys)看来有望为我们了解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聚落提供很有潜力的信息。

用区域方法研究新石器—红铜时代聚落变迁实力的一个极佳案例来自匈牙利,在那里,自 1998 年以来,帕金森一直研究匈牙利大平原从新石器晚期向红铜时代的过渡。新石器的科洛斯聚落系统由大型土丘主导,更南面也有类似发现。新石器陶器形制差异很大,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区域性。当红铜时代开始时,土丘被放弃,后续的聚落系统以小型村落的生活为特点,比如维兹托—毕克里遗址,这是处单一构造的提扎波尔加(Tiszapolgár)村落,自 2000 年以来由科洛斯考古项目发掘。在提扎波尔加时期,陶器形制在整个区域十分一致,也许表明互动程度加大。传统上,聚落形态的这一变迁被用日益依赖牛群的“第二次产品革命”来解释,这需要一种分散的聚落形态。根据区域规模的材料,帕金森声称,聚落变迁是由于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转向一种部落管理模式,以限制当时分散延伸家庭之间的社会竞争。此外,在维兹托—毕克里的发掘证明了一种混合的维生经济,与以前想的有点不同:不大依赖牛群,很少发现红铜,因此匈牙利在向红铜时代过渡中,金属加工所发挥的作用不是很清楚。

帕金森与贝利相比,具有一个很大优势来获得区域调查资料,这是由匈牙利考古学家多年来逐个县收集和标注在地图上的材料。发表的匈牙利勘察图,使得帕金森能够为他所研究区域的每个红铜时代遗址的位置重新定位,采集代表性陶器的样品,并评估遗址的规模。这一研究为他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基础,并在维兹托—毕克里遗址加以检验。虽然,帕金森不是近年来唯一关注科洛斯—提扎波尔加过渡的考古学家。查普曼在帕金森的北面工作,也采取一种区域方法,但是他的研究集中在土丘作为权力符号的社会象征意义上。

在伊比利亚,铜石并用时代聚落系统的发展看来与欧洲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最早的欧洲“武士文化群”(warrior complex)发现在西班牙东南部,根据吉尔曼源于恩格斯的叫法,称之为“德国”生产模式: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使财富如金属流通。在伊比利亚的红铜与青铜时代,大型、复杂、常常筑

有围墙的聚落出现,而分层常常表现在墓葬的财富区别上。最终,在青铜时代整个欧洲,出现了相同的政治结构变迁,大约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整个欧洲的聚落形态反映出初步的社会复杂化。

欧洲青铜时代中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在希腊,早期青铜时代的崩溃伴随着聚落形态的变迁,中期青铜时代聚落常常筑有围墙,建立在远离海岸的高地上,而海岸则是早期青铜时代聚落偏好的位置。北上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那里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明证,特别是土地分割和建起了围堤。不过,重要的是,只是在青铜时代晚期,而且只是在希腊,聚落变迁和土地利用推动了政治的转型,在欧洲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国家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国家。

#### 为国家服务的聚落

就像最早的文字证据那样,欧洲最早的国家见于希腊。最初的米诺斯书写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和所谓的“线形文字 A”尚未破译,因此对克里特岛上聚落变迁研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迈锡尼的“线形文字 B”已被破译。实际上,它们确实谈到了许多有关大陆和克里特岛上的聚落,在那里“线形文字 B”是在克里特青铜时代最晚期使用的,大约伴随着迈锡尼的占领。

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迈锡尼国家的成立,并建造了伴生的宫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始于晚期青铜时代的早段,也许是受到了与较早的原生国家如埃及接触的刺激。比较清楚的是,迈锡尼的统治者对聚落很感兴趣,民众住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如何能更好地对他们征税。最大一批“线形文字 B”泥板出自美塞尼亚西南部皮罗斯(Pylus)的“内斯特宫殿”。有好几块泥板列有宫殿的名称,特别是“Ma”系列的泥板。自文字破译以来,考古学家忙于将这些宫殿名称与在仔细和广泛区域勘察中发现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 IIIB 的遗址相联系。最近探究迈锡尼美塞尼亚的项目是皮罗斯区域考古项目,而约翰·贝内特作为这一项目的领队,已经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涉及皮罗斯附近宫殿形成前后的聚落演进。

贝内特将区域规模的调查与“线形文字 B”的材料仔细结合起来,表明“皮罗斯线形 B”权力的兴起经历了一系列的步骤。最终,皮罗斯控制了大约 2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在文献中分成盎格利安诺斯山脉两侧“这边”和“那边”的省份。线形文字

B“税收”文献的结构,看来表明皮罗斯最先控制了直接的“这边”领土,后来将控制向东延伸,到达“那边”的省份。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始于希腊青铜时代初(大约 1700BC),并以在整个区域各遗址营造纪念性的蜂房墓为标志,特别是在皮罗斯本身,而后是在“那边”省份的次级中心如尼科利亚(Nichoria)。贝内特以这样的行为表明,宫廷对领土控制的进展。在营造蜂房墓的同时,有的地点允许不采用,皮罗斯的聚落不断发展,最终达 12~14 公顷。大约到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 IIIB,该聚落形态已鹤立鸡群,而在“那边”省份可能由宫廷建立了好几个镇(泥板上记载了九个),作为区域税收中心。而有许多遗址被完全废弃,特别在“那边”的省份。就如贝内特和谢尔默丁所形容的,就美塞尼亚聚落系统变迁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控制当局的皮罗斯,能够以牺牲某些遗址来鼓励某些遗址的繁荣。”

“线形文字 B”泥板看来表明,皮罗斯的宫廷管理对收集周边群体某些原料和产品很感兴趣,必要的话还用武力夺取,总体而言得到了考古学的确认。而且,宫廷看来还操纵现有的聚落系统来保证物品有效和不受干扰地流向宫廷。获得良田看来并非要求聚落结构变迁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反,正如吉尔曼所言,对于红铜和青铜时代的伊比利亚,宫廷的主要关注是通过征收农业剩余产品来驾驭用于生产各种产品以及维持这类企业的劳力。劳力与物品,比如陶器和黑曜石石叶,宫廷对这些东西的控制并不在意,所以在“线形文字 B”文献中并不提及;有些人的生活和劳作很可能不受宫廷管理者及其代理人的管辖。

迈锡尼宫廷管理体制大约在 1200BC 崩溃,尽管有中间的黑暗时期,古典聚落系统看来至少仍带有某些青铜时代晚期的表面共性。考古学和历史性的材料都表明,古典村镇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城市”区域,即“城邦”区。虽然镇依赖周边乡村的农业剩余产品,但仍不清楚的是,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在某些情况下,村镇共有一种互惠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关系以镇为主导。这些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从不同地方的希腊艺术和文学中表现出来。就迈锡尼聚落而言,需要进行管理的主要资源并非土地本身,而是能够从主要资源如谷物中提取剩余产品的劳力。鉴于迈锡尼人建立起一种散



中心的主要财政(staple finance)体制,使得现有的聚落系统服从他们的需求(支持集中财富经济的宫廷体制),古典希腊人(以及他们之后的罗马人)很可能鼓励闲置土地,建立一种地产管理体制。于是,在希腊工作的勘查考古学家一直特别想分辨古典期和后来的“农屋”,尽管要精确地做到这点很难,特别是在对小型遗址没有做系统发掘的地方。

鉴于最早国家在希腊兴起,那么第一个欧洲帝国是由罗马人建立的(当然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呼声很高,但是他的帝国是在东部、主要是在亚洲建立的)。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人复制了最初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立的欧洲殖民方式,后者占领过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于是殖民主义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欧洲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建立在这些殖民主义的研究上,许多学者常常采取一种区域方法讨论罗马帝国扩展和统治的问题。

在一项结合了许多细致区域勘查成果的突破性研究中,阿尔科克从希腊景观结构包括聚落变迁的角度,分析了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将其融入帝国之中。她将考古和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追溯征服前、当中和之后希腊各种景观演进的轨迹(如农村的、城市的、行省的和神圣的)。这一全方位途径证明,罗马对希腊的策略与用在其他地方如高卢和不列颠的策略不同,不同的聚落形态对入侵的反应是不同的。罗马人承认,欧洲许多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聚落历史,因此需要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希腊和罗马之外,在罗马实施统治之前,青铜时代的欧洲并没有发展出国家层次政治结构的集中体制,因此,罗马鼓励某些城邦实施将希腊公民移入城市,使得地产制失效。例如,有些欧洲人如凯尔特人,他们住在山头城堡中,有点类似希腊的城市国家,但是以部落政治体制行事,允许个人有某种政治的独立性。不像希腊的公民身份比较稳定,部落的联系变化不定。在希腊无法实施铁板一块的帝国管理,那么总的来说肯定也无法在欧洲实施。但是,欧洲青铜时代政治结构、经济和土地所有权的共性,确实能让罗马人采取某种统一标准的征服体制。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the pax Romana]指被征服者可以心怀不满,但是只要接受罗马统治,可以过太平日子——译注),青铜时代的武士酋长要么在战争中被击败和废黜,要么与希腊结

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酋长被同化,成为罗马化第一代行省的贵族统治者。欧洲酋长往往控制着他们领地内的贸易和财富生产,而现有的政治经济能够很容易地融入罗马帝国经济中去。最终,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比如建立起罗马风格的别墅,将本地的聚落系统按照罗马行政管理的要求规范安置。反过来,罗马的聚落系统为后来中世纪的聚落系统和土地所有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最近几年里,中世纪和欧洲史后段成为考古学详细调查的目标,其大部集中在聚落和聚落形态上。这需要仔细整合文献和考古资料。例如,瑟斯顿设法结合考古调查、土壤磷酸盐分析、发掘和文献研究,来获得瑞典的斯堪尼亚地区在AD700~1075年融入维京国家时聚落变迁的一种生动图像。例如,尽管有来自法兰克人的外部威胁,但是斯堪尼亚起先拒绝合并。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就控制着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当地贵族抵制新贵族,后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发展中的国家系统实施集中的行政管理。当推进合并时,聚落系统发生了巨变,村落规模缩小,中心市场的镇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造起了教堂。瑟斯顿得出这样的结论:“统一是通过贵族持续渗入到当地系统中而取得的,开始是类似于结盟的霸权控制和社会互动,如礼金和通婚,随着设法垄断市场交换,接下来是对该地域实施重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最终,是代价最大的策略,对斯堪尼亚起义最后诉诸武力。”

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实施相似的“对当地体制的渗透”,总是与聚落的变迁有关。这种变迁起先发生在靠近罗马原来的中心和君士坦丁堡附近,后来扩散到欧洲的边缘。最终建立起一种封建制的欧洲聚落系统,并由各种有势力的大佬实施管理,法兰克国王、威尼斯总督、奥斯曼苏丹王和天主教教皇。当然,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聚落也随之发生变化。

### 结论:迈向过去

欧洲的景观和聚落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主要的进展,不管是理论还是方法都是在过去十年里确立的。下一个十年有望成绩更加显著,但是挑战依旧。最近几年,在有些国家里,由于缺乏资金(如英国)或政治矛盾(如希腊),对新区域的勘查步伐有所放慢。同时,就如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在持续

(下转第145页)



到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标准。但普通古籍的保存环境依然简陋,只放置于樟木柜中,破损情况十分严重。全省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多数处于自然状态,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

二是古籍保护人才匮乏。自2007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国家举办多期古籍鉴定、古籍编目、古籍修复等各个层面的培训班,极大地充实了古籍保护人才队伍。但古籍保护人才匮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江西省图书馆为例,该馆古籍藏量约50万册,而古籍从业人员仅有12人,其中古籍专职编目人员5名,读者服务人员2名,古籍修复人员3名。大部分江西省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市县馆无专职古籍从业人员,不少古籍收藏单位任凭古籍自生自灭。“古籍保护人才的匮乏不仅反映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古籍整理编目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刚刚进入古籍工作行业,还缺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也有待提高;保护修复人员中,不少人修复理念落后,甚至对不利古籍保护的修复手段推崇备至”。

### 三、古籍保护工作意义

#### 1. 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需要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古籍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记载,人们可以据此来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古籍承载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我国悠久文化的历史见证和维系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脉。对这些古籍进行妥善保护,是我们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

#### 2. 发掘文物、保护文物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作为文物受国家保护。可见,古籍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就文物价值而言,度藏古籍的图书馆和度藏钟鼎彝器的博物馆相比,也毫不逊色。

#### 3. 江西省公共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工作上的意义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文献留存丰富。江西古籍保护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初步统计,江西省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占全省古籍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做好江西省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对推动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乃至中华古籍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各级公共图书馆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改善古籍保存条件,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使古籍保护工作得以全面、有序进行。古籍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文化传承使命神圣而光荣。

注释:

苏品红:《实施古籍保护计划若干问题的思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年第2期。

王世伟:《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第1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2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上接第123页)

蚕食越来越多的欧洲乡村田野,于是销毁了重建区域聚落形态所必须的地表遗存。这种考古资源的持续消失也许是欧洲聚落研究一个最大的威胁。

我们的分析工具在不断改善,特别是GIS和遥感,虽然有些考古学家对细致地表勘察来准确把握过去的聚落形态、特别是史前和早现代的聚落形态,仍然心存疑虑。即便如此,大部分欧洲区域考古学家仍然坚持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在调查和区域分析中寻找新的和更好的做法。

有些考古学家也对区域考古学家的理论观点提出挑战。比如,福蒂亚迪斯告诫我们,要抵制一种诱惑,用现代小型村落(特别是希腊)的类比来构建过去聚落形态的解释,给人以一种看似“永恒”的感觉。我们调查广泛的区域形态、以及询问有关政治和经济“重大”问题的能力之所以一直受到质疑,是因为欧洲许多勘察的规模比较小。作为回应,

有些考古学家现在设法结合从各种勘察项目中获得材料,以求建立一种更大的图像,这最早是由苏珊·阿尔科克开创的方法。阿尔科克和彻里最近在密歇根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肩作战的勘察”,讨论整合勘察材料库的课题。以迪堡大学佩达·福斯和丽贝卡·欣德勒为首的另一批地中海考古学家群体,试图构建一个地中海全范围的GIS,来储存和提供迄今为止在该地区所做的全部勘察项目的基本材料以及后续资料(见<http://cgma.de-pauw.edu>)。

这些对理论和方法的反应,肯定将有助于将欧洲区域研究推向一个发现的新纪元。我们期望,我们对聚落形态和聚落形态变迁的了解将越来越清晰。我们对这项探索的永久承诺,将使得我们能以新的眼光,从全方位不断更新对欧洲景观精彩多样性的看法。



## 本期导读

### 一.《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 also 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陈淳)

### 二.《七叶树果实的食用习俗与石锤及石砧》

本文译自桥口尚武《食の民俗考古学》第四章。该书详细描述了日本人民如何利用海洋和陆地各种食物资源的方法。本章则集中介绍了七叶树和日本各地以七叶树果实为食物的历史、七叶树果实的加工方法及与加工相关的石锤、石砧的类型和特征等等。以橡子为代表的坚果曾经是中国史前许多地区的食物,河姆渡、田螺山等遗址出土过不少橡子,但我们对它们的加工方法和食用方法,它们在史前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均无深入研究。因此,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考古学的各种观察和分析,民俗学和实验考古学的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尽管本文介绍的不是橡子,而是我们不很熟悉的七叶树果实,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共性,本文介绍的七叶树果实的去壳、去涩和加工成入口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作为食物的橡子的加工处理过程有很大帮助,对于从考古上如何辨认与橡子加工有关的遗迹、遗物,进而认识坚果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深有助益。

(陈星灿)